胡鳳超留在人世間的眼角膜在註視著我們

新工人藝術團 2017-07-31

一位掙紮在死亡線上的

工傷工友在新媒體時代的遭遇

·郭春林·

一

我不認識這位工傷工友胡鳳超，但我“認識”他得的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簡稱再障），極其兇險，一旦遭遇，基本上難逃魔爪。一年多前去世的建築工人老賈得的也是這個病（詳見拙作《薄奠》）。胡鳳超從6月初確診覆發以來，一直在醫院裏期待著，等待著。期盼，甚至乞求著社會的關註；等待奇跡的出現，但同時，他心裏也很清楚，他還在等待著死神的降臨，死神的君臨，甚至是惠顧、召見之時，就是他的痛苦解脫的時刻，也是他年逾古稀的父親解放之日，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擺脫痛苦的時辰到來之時，更是他債務的終結時刻。

這一刻終於來了。小葉告訴我，7月23日下午4點多，胡鳳超走了，一個年僅32歲的生命在病痛中走完了他全部的人生。

胡鳳超的故事就是小葉告訴我的。小葉在蘇州一個城中村的公益機構工作，主要為工傷工友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服務。7月5日，他給我發來一篇待推送的文章《新工人患職業性苯中毒，網上求助……》，征求我的意見，大概也是希望我廣為傳播，以此獲得一點捐助，為文章中的苯中毒職業病患者胡鳳超減輕一點負擔。第二天文章發表了，截止到7月26日，閱讀/點擊量共計462，一共獲得打賞金438元（其中有我的200，小葉說太多了，倒不是真的嫌多，大概還是覺得我與胡鳳超素昧平生，再說也不是正式的募捐），小葉給胡鳳超妻子匯去500元。然而，這一點點錢相對於胡鳳超每天過萬元的醫療費，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

據小葉從胡鳳超的妻子那裏得到的消息（通過微信），胡鳳超那時候雖然仍在醫院中接受治療，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身體機能都在衰竭中，連呼吸也越來越困難。胡鳳超得的不僅僅是再生障礙性貧血，而且是這個類型中最兇惡的“重型再障”。2012年經大連市醫院鑒定為職業病。而這一次是覆發，比第一次更嚴重。

今年6月6日，胡鳳超在微博上發出“堅強的活著”的博文，簡單地講述了自己的病情和生活狀況，並通過@的方式向社會求助（詳見新浪微博“職業病人胡鳳超”的微博）。之後，治療中的胡鳳超一直通過發微博，@名人和媒體，以及相關機構，希望有人伸出援手。後來的一個多月裏，據筆者與胡鳳超微博私信，沒有任何一個媒體，更沒有任何一個名人聯系過他。

但就在胡鳳超辭世前幾天，突然有兩三家媒體相繼報道了胡鳳超的事情。先是7月19日騰訊新聞的“遼沈晚報-聊沈客戶端”編發了題為“鞍山帥氣小夥罕見血液病 想捐獻遺體和器官”的文章。該報道在騰訊新聞截止到7月27日有98條評論，絕大多數都是網友們鼓勵的話。翌日，《遼沈晚報》數字報發表題為“結婚兩個月舊病覆發 他決定捐獻全身器官和遺體”的報道，“鞍鋼郭明義”公眾號同日推送該報道，次日《遼沈晚報》推送同題微信。7月22日，《遼沈晚報》及騰訊新聞-聊沈客戶端和東北新聞網發表胡鳳超簽訂捐獻遺體和器官的證書話題的報道和後續報道，騰訊新聞和《遼沈晚報》的標題是“病重小夥登記捐遺：這下心裏踏實了”，東北新聞網的標題不過是將“捐遺”的縮寫補齊為“捐獻遺體和器官”。三則報道均無法查看閱讀量。

據《遼沈晚報》報道，這一次是胡鳳超主動打電話給媒體。實際上，胡鳳超早在6月8日的微博上就已經表達了這個意願，並@主流媒體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者聯盟”的官方微博，然而，僅有6人次轉發，且均為個人。而自他6日發布覆發的微博，一直到7月23日停止呼吸，共發布微博近四十條，轉發量合計148人次。這個數字，放在新浪微博3.4億月活躍用戶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即使是他置頂的7月6日的“一個再生障礙性貧血職業病工人的故事”也只有31人次的轉發量。

還有一件與新媒體有關的事情是，6月4日，已經在大連市解放軍210醫院就診的胡鳳超在“輕松籌”發起募捐活動，署名是“一個職業病人在死亡線上的最後一次呼喊”。活動募集目標20萬元，用於骨髓移植，差不多一個月後，該項目結束，共有554人參與捐款，募得19130元，完成率9%。

二

從胡鳳超的微博中，我們大抵可以知道這樣一些信息。

胡鳳超，1985年1月出生於遼寧省鞍山市台安縣西佛古家村，父親胡玉香，今年71歲了，母親已於2001年病故。因家貧，四兄弟中最小的胡玉香一直未能娶妻，直到80年代初，人販子將已經在四川成家的胡鳳超母親騙賣到胡家，已經三十多歲的胡玉香才終於成了家，也才有了胡鳳超。但據鳳超說，被拐賣後母親並沒有多少反抗，而她的身體原先就不很健康，之後又患糖尿病，生活的艱辛和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使她早早地就撒手人寰，留給已經漸入老境的丈夫和年幼的兒子因治病欠下的大筆債務。為了養家，為了給母親治病，年幼的胡鳳超不得不在初中階段就輟學打工，承擔起沈重的生活重擔。母親去世後，胡鳳超和父親相依為命，辛辛苦苦，奮鬥五年後，終於還清了欠債，他開始為他自己和父親的養老而努力工作。2010年3月，他經朋友介紹，到遼寧省大連市中國華錄松下電子信息有限公司（中日合資企業）工作。他被分配在塗裝課，“就是把塑料零部件噴塗幾層油漆，變成成品的零部件”（2017.6.28）。也正是這個塗料使胡鳳超苯中毒，成為又一個再生障礙性貧血的患者。但初中都沒有畢業的胡鳳超並不知道塗料中含有在不久的將來致他於死地的苯這個超強殺手，當然，他也沒有被告知，還是當然，工廠在環境檢測中同樣是達標的，否則胡鳳超就不可能因此而中毒。他說：“松下給我們做了15天的入場前培訓，我表現的（得）特別好（，）所以分到了一個特殊的崗位——塗裝課，班長和我們聊天時說這個課活多、工資高，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個有毒有害的工作環境，也沒有人和我說過這樣的工作對身體有什麽害處。只知道工資高多賺點錢好回老家娶媳婦孝順老爸。”（2013.10.10）經歷過貧困的人，我相信都應該完全理解胡鳳超當時的選擇。但要緊的是，按照胡鳳超的敘述，去塗裝課，竟然被企業管理者當做一種獎勵，然而，胡鳳超為這個獎勵，為這個高工資付出的代價是他的生命。

但工廠顯然是知道這一切的。華錄松下公司每年都會給員工安排一次體檢。第一年檢查，胡鳳超沒事，第二年年底體檢，胡鳳超就被查出“三系減少”，建議到血液專科進一步檢查。經大連醫大二院骨髓穿刺，確診為再障。大連醫大二院的三個月治療均告無效，胡鳳超通過微博認識了天津義工聯盟的志願者，經他們介紹，征得公司同意後，胡鳳超轉院到天津的血液病研究院治療，公司一次性給付30萬元醫療費。於是，住院治療，服藥，再檢查，終於在2013年7月，血象指標基本正常，同意出院。但仍然必須繼續服藥，且要持續三年，每年骨穿覆查。至2016年10月停藥，期間醫藥費均由原工作單位承擔，且一直享受職業病的工傷保險等社保待遇。已過花甲之年的父親自然是始終陪護在側，他是唯一的親人，而這令過早嘗盡了生計之艱難的胡鳳超心中愧疚不已。

2016年11月，胡鳳超遇到了他現在的妻子。在見面的第一天，他就毫無隱瞞地告訴了她自己的病史，但她並沒有離他而去，善良的她希望自己能夠補償他未能獲得滿足的母愛。兩人於2017年5月登記結婚，並商定了辦酒席的時間。然而，不久後，胡鳳超發現身上生出紅色的血點，於是再度住院，並被確診為再障覆發，並伴有肺部嚴重感染等並發癥。

對死亡的恐懼，對尚未開始的家庭生活的向往，和對老父親的擔憂，使他焦慮、不安，他一次次地用幾乎是他唯一的渠道，在微博上@央視新聞、CCTV等著我及該欄目組主持人，以及遼寧的地方媒體，還有一些他喜歡的熱心公益的演員，及他知道的一些公益機構。但這一次，他就沒有上次那麽幸運了。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媒體方式和媒體環境的變化，更直接地說，就是在普通人的日常交往和社會交往中，微信取代了微博，成為使用最多的媒體形式。

三

2013年底，基本恢覆了的胡鳳超準備去職業病防治中心交報告，進行職業病診斷。他在微博上也表達了對未來的憂慮：“骨髓增生還是極度低下，造血細胞缺乏醫生說如果不能堅持吃藥還是有可能脫不開輸血的可能。”（2013.12.1）但從他的文字和使用的表情圖，還是可以看到，他的情緒已經不再是治療時期常常表露出的焦慮、悲觀和對父親的愧疚，甚至，即使是這樣的時候，他還會在微博上開導、安慰、鼓勵那些陷入困頓中的人們（2013.3.23），在感恩節的時候，他會向關心他的人、向社會表達他的感激之情，他也堅定地“相信這個世界會有愛的”（2013.2.22），可以肯定地說，他的生活態度基本上是積極的，樂觀向上的。他是個善良的年輕人。而素未謀面的熱心網友和公益機構及其志願者也確實給予他關懷和照顧，有網友看到他發的父親給他泡方便面的帖子和照片時，會熱情地說：“等你來天津了，給你帶好吃的。不讓你天天吃泡面。”（2013.2.21）然而，四年後的胡鳳超已經不可能在微博上遭遇這樣善良而熱心的陌生人，因為媒體的環境已經徹底改變。

2013年正是移動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一年，在整體高速發展的狀況中，微信明顯高於微博。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3年中國社交類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即時通信在整體網民中的覆蓋率達到了86.9%，其中微信覆蓋率為61.9%；社交網站（包括QQ空間）覆蓋率為60.7%；微博覆蓋率為55.4%。”當時的移動互聯網還被稱為“即時通信”。據統計，“網民在微信上使用較多的內容分別為文字聊天、語音聊天”，“從社交關系的強弱來看，微信的聯系人更傾向於強關系，其次為社交網站，最後為微博。……微博的弱關系體現在：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同學等強關系聯系人出現比例遠低於微信和社交網站，而明星、陌生人等極弱關系聯系人出現的比例又較高。”而根據2014年初發表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3年的整體狀況是，“網民規模達6.1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5億”，調查得出的結論之一是“中國網民規模增長空間有限，手機上網依然是網民規模增長的主要動力”。

胡鳳超就是5億手機網民中的一個，微博顯示他那時使用的是華為榮耀。這裏的強關系和弱關系，正是上文所說的“普通人的日常交往和社會交往”關系的強弱變化。也就是說，雖然，微信的覆蓋率早在2013年的時候就已經超過微博，但其主要功能則是既有朋友圈的交流、溝通（參看圖一），微博所具有的公共性明顯是微信所不及的，即使這一公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運營的資本化原則及其所屬企業的私有化屬性，可它畢竟提供了一個遠大於基於手機通訊錄的社會關系，這一社會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階層固化所帶來的限制。我絕不是要美化、誇大微博這一新媒體對愈益嚴重的階級分化所具有的消解作用，更不是要將微博這一建立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中的私有化的新媒體看成政治解放和民主化的輿論空間，但胡鳳超在2013年通過微博的發布、傳播而能夠得到及時治療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一事實證明了基於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社交新媒體畢竟為社會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公共空間，也為需要救助的原子化的個人或家庭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渠道。實際上，80年代後期一直到現在，國家/政府的基層組織（農村的村委會和城市的居委會以及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單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上已經名存實亡，它們多半已經被自上而下的體制化的力量和自由市場的力量所瓦解。對即使有一般社會保障的新工人個人或家庭來說，常常在遭遇災難的時候，依靠既有的家庭關系也無法解決困難的時候，只能向社會求助，而其手段也只能是新媒體。這其實也是這些年廣泛得到使用的眾籌形式普及的重要原因。

（圖片：來自網絡）

至2016年底，“網民規模達7.31億……手機網民規模達6.95億……手機網民占比達95.1%，增速連續三年超過10%”，“移動互聯網與線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並推動消費模式向資源共享化、設備智能化和場景多元化發展。”（《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一句“線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已經頗為充分地說明了經濟聯系是移動互聯網的主要功能，然而，人與人之間並不只有經濟聯系，但資本和由資本支持的技術卻將經濟聯系作為技術開發的主要目標，而將傳播的本意——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以及意義的傳播和符號的交換——棄之一旁。正因為此，新浪微博才能在社交領域的重要性被微信取代後，成功通過徹底商品化的方式實現扭虧為盈。2017年新浪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微博的月活躍用戶數（MAUs）從2016年3月的2.61億增長至2017年3月的3.40億，同比增長30%。微博月活躍用戶數中91%為移動端用戶。……廣告業務毛利率的上升主要得益於微博廣告客戶的旺盛廣告需求，以及微博和門戶業務成本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微博可以通過支付寶等付費方式進行推廣無疑就是其廣告收入的重要來源。微博在今天的主要功能已經不再是三四年前的表達和傳播的功能。胡鳳超在微博上的求助如泥牛入海也就是必然的結果，這個結果造成了胡鳳超的死。

四

還是讓我們來看看胡鳳超生命最後的四十七天裏的新媒體“生活”吧。雖然這很殘酷，但今天的人心已經足夠硬，硬到足以不被一般的殘酷影響食欲、性欲、物欲和權力欲，甚至從消費的角度來說，更強烈的殘酷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抵抗力和窺視欲。

6月6號，胡鳳超繼2013年基本治愈再障後因覆發再次發微博向社會伸出求助之手。這一天他發了兩條微博，一條就是上文所說的“堅強的活著”，另一條是轉發“大連骨髓移植-BMT”發布的關於郭明義愛心團隊“聯手‘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募集資金，捐助重癥血液病女孩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微博，他@了“鞍鋼郭明義”。而第一條，他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病史和覆發的現狀，但這次沒有提及父親，而是敘述了他的愛情成果，並特別添加了五張他與新婚妻子親昵、幸福的照片。最後說：“希望今天看到這篇微博的請您轉發留言，我需要骨髓移植，我想活著！@半島紀永江 @大連晚報熱線84323110 @大連說 @新聞大連 跪求各位媒體能了解我的事情。”

6月8號的微博見下圖：

（胡鳳超的微博）

我之所以特別將這條微博截圖，既是為了證明微博實際上已經成為商業廣告的主要形式，對很多設立了官方微博的媒體、機構以及其中的個人來說，微博已經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甚至就是聾子的耳朵，只是一個擺設，有些雖然還在進行日常的更新，但基本是形式主義化的。也就是說，微博作為信息傳播的概念基本喪失了，此其一；其二，如果上述結論有誤，另一種可能是胡鳳超這樣的信息對這些媒體和機構而言，已經沒有價值，因為這樣的事情每天都會發生很多起，即使是捐獻遺體和器官，而這也是最可怕的；第三，這也證明了後來報道該事件的《遼沈晚報》所言不虛。而他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要打電話主動約請媒體，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沒有等到主動聯系他的媒體，也許他已經預感到時日不多，對生的渴望與對死的恐懼緊緊地抓住了他，對曾經給予他關懷的社會的感激和對老父親即將面對的孤苦的歉疚、不安、焦慮激烈地撞擊著他其實已經不堪一擊的脆弱的心理。我難以想象32歲的胡鳳超躺在病床上的內心世界是怎樣一種激烈的糾纏，我也難以想象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小夥子如何承受這樣的沖擊，我更無法想象他獨自面對死亡的每一分鐘裏所忍受的煎熬，最讓人心碎的是，始終陪在他身邊的年逾古稀的父親，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兒子一步步地走向死神的懷抱，他毫無辦法，除了哭泣。看著這幾行泣血的字，一種痛徹心扉的沈重久久不去。

6月9號他給梨視頻發布的陌生司機和警察護送遲到的高考考生赴考場的視頻點讚，該視頻有2544次轉發，3809條評論，27603個讚。但胡鳳超前一天發布的微博，一個還年輕的生命，還沒有被宣判死亡就打算將遺體和器官捐獻出來的生命的呼號，卻只有6次轉發，7條評論和一個讚。生命的不平等就這樣觸目驚心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今天的媒體環境和社會環境。個人的信息在資本強有力推動下所生產出來的信息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無足輕重，除非它包含了媒體產業感興趣的內容。

隨後的幾天胡鳳超沒有微博，大概是高燒不退，無力想和寫的緣故，也有可能是去找可能為他提供幫助的單位了吧。12日，他發布了一個比較長的微博，題目是“我的打工遭遇”，比較詳細地敘述了自己的打工經歷，包括家庭情況，患病原因、治療經過，以及目前的處境。他提到了單位領導和大連市總工會，說都沒有辦法，“現在我躺在醫院病床上也不知道向哪裏求助了，希望有關部門看到！”“希望看到的網友朋友們轉發”。隨後他將這條微博發了五次，每次都@不同的媒體、媒體人或演員，大概還有他的微博好友。這一次的轉發量42次，也是最多的一次，但是仍然沒有任何一家媒體聯系他。

6月13日早晨，他將昨天的微博又以@不同單位和個人的方式發了兩次，零轉發。晚上八點多，不灰心的胡鳳超對之前的博文略作修改，將題目改為“我的遭遇”，去掉了也許在一些人的眼裏含有低賤意味的“打工”二字。開頭部分加了“（尊：按原文漏字）敬的各級領導、媒體朋友、社會各界愛心人”，結尾部分是：“因為這個是職業病，我希望單位能夠再次幫我一回，救我一命。但是我和單位領導溝通沒有任何效果，大連市總工會也沒有辦法，現在我躺在醫院病床上也不知道向哪裏求助了！只能在我現在稍微還有一絲絲體力的情況下發微博求助社會各界的好心人士！！！希望各界的好心人能夠幫我一把！為了老家只剩下我一個親人的老父親，為了我那個剛剛新婚不久的妻子，我想努力的活著！”如今商業營銷模式都是P2P、O2O，點對點了，幼稚的胡鳳超還使用著幾十年來的官方語言，說什麽“各級領導”，“社會各界愛心人”，除了幾個網友的轉發外，依舊是石沈大海，杳然無聲。

五

14日，胡鳳超發了一段躺在病床上的視頻。他在嘗試其他的方法。

次日，他以轉發“央視新聞”正在直播的節目“走絲綢之路，到奧林匹亞”的方式繼續向仿佛如無物之陣的社會求助。

五天後的上午九點多，繼續轉發“我的遭遇”，這一次他@的都是北京的單位：“北京發布”、“北京青聯”、“北京站官方微博”、“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和“文明北京”。差不多一個小時後，以“愛心接力大愛京城”為題，稍微修改了之前的博文，繼續他無望的求救，但他不絕望，他說：“您的每一次一（按：原文如此）轉發都會給我帶來生的希望，幫幫我和爸爸吧相信這個社會是充滿正能量的”。他除了相信，還能怎麽辦？這一次的圖片是他蒼白的病容和被高燒汗濕的衣服和褥子，布滿血點的雙腳，還有他坐著睡著了的父親。

四天後他不得不再次向2013年曾經給了他很大幫助的“天津義工聯盟”求助，希望能夠再去天津治療。這一天他還為上海《新聞晨報》報道的“張繼科圓血癌少年夢”的微博點讚。

6月26日，他竟然發了九條微博，是這次再障覆發以來發布最多的一天。文字基本上還是之前發的那些，照片除了重新組合一下，新添兩張插著輸氧管躺在病床上的。依然是蒼白的臉和無力然而渴望的眼神，看著手機攝像頭，看著空洞的世界。那樣的眼神令人無法直視。

6月27日，兩條微博，加一個點讚，一位大連的、使用iphone6s plus的網友轉發了他的帖子，並且寫了“加油挺住”四個字。我不知道，胡鳳超看到有人轉發的那一刻心裏是怎麽想的，也許每一次轉發對他來說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每一根稻草最終都斷了，希望在一點點地消逝。翌日，他發了兩則微博。其中有一則@了CCTV等著我以及兩位主持人，但他在倪萍的名字後面加了“媽媽”，在舒冬的名字後面加了“哥哥”，並且說，“求關註一下現在高燒不退肺部感染病情非常嚴重，求您幫我找到我同母異父的哥哥”。在胡鳳超所有關於他母親的敘述中，似乎並沒有這麽一位同母異父的哥哥。也許真有，也許真沒有。但我判斷應該是沒有。那麽他就是胡鳳超杜撰出來的，說到底，是一個策略，是為了與CCTV“等著我”欄目的內容呼應，為了引起主持人或欄目組相關人員的註意。這一回，再次落空了，他的計策再次失敗了。如果說這是個小小的伎倆，那也是一個已經在死神的註視下掙紮了二十多天的年輕人不屈從命運的唯一手段。他已經無計可施，他只能虛構這樣的故事，竭力引起人們的關註，只有關註和救助才能使希望之火再次燃燒，使處在生命懸崖上的他回到安全之地。

29日，除了他以網頁鏈接的形式公布了輕松籌項目的結束情況外，還有一條被刪除的微博，不知道被刪的是什麽。

一個星期後的7月6日，胡鳳超再次@很多人，發了一篇長博文。這篇不一樣博文正文前面有一段類似編者按的文字，這段文字是小葉前一天晚上寫就的。整篇合在一起，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葉所在機構的公眾號推送的那篇文章。但微博沒有排版，沒有註明編者按，乍一看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麽回事。小葉在編者按中說了，這幾年他也很少上微博，幾天前偶然登錄微博，看到了胡鳳超的求助。當然，小葉在這之前就知道胡鳳超，也知道他患再障的職業病，但他沒有想到竟然又覆發了，而且來勢洶洶。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做點什麽。於是主動聯系了胡鳳超，將他的博文略作修改（據小葉說，胡鳳超的妻子也參與了修改），加寫了按語，在他負責的公眾號上推出，並開通了打賞功能，希望能夠得到一點資助。小葉在按語的結尾部分說：“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有201.9萬人享受工傷待遇（這個數字不包括企業未參加社會保險的工傷工友），這個數字可以說明一點，那就是，工傷一定不是簡單的個人問題。”胡鳳超將這篇博文置頂。雖然有31次的轉發量，但並沒有改變什麽，似乎一切都在按照一個神秘的意志走在既定的軌道上，而胡鳳超的軌道就是越來越近地走向死神的懷抱。

7月9日、10日，胡鳳超再次轉發6日的博文。14日，博文只有簡短的“滾蛋吧腫瘤君滾蛋吧我可能挺不住了以後沒有回覆可能我真的完蛋了”，而這也是他留在新浪微博上的最後的聲音。

六

今天的時代裏，沒有人能挺得住。

離世九天前，胡鳳超停止了他的微博生活，也許是主動，也許是體力不支。但我寧願相信是他主動的選擇，微博這個新媒體既沒有給他帶來一絲一毫的希望，更沒有給他帶去一點一滴的實質性的幫助。因為微博早已重新界定了它的功能，新浪公司的老板說：“新浪公司是一家服務於中國及全球華人社群的領先網絡媒體公司。新浪通過門戶網站新浪網（SINA.com）、移動門戶（SINA.cn）及移動應用提供方手機新浪網（新浪移動應用）和社交媒體微博（Weibo.com）組成的數字媒體網絡，幫助廣大用戶通過電腦和移動設備獲得專業媒體和用戶自生成的多媒體內容並與友人進行興趣分享。”（新浪2017年第一季度財報）是的，微博如今只“分享興趣”，胡鳳超卻要讓人來分享、分擔他的痛苦和苦難，簡直就是癡人說夢、緣木求魚。興趣與商品的距離最近，興趣也可以並且已經商品化，但苦難很難，真正的苦難也不可能被商品化，而已經完全商品化的微博世界中也就不可能有胡鳳超存在的空間。曾經的微博其實已經死亡。

最後，他不得不選擇以電話這一相對傳統的媒體方式將記者約請到醫院。我不知道胡鳳超以什麽理由說動了記者，又以什麽方式把記者請來（必須申明，這裏的記者並不指向具體的媒體單位和某位記者，而是作為一個集合名詞，一種職業）。自然，媒體記者已經不再通過微博了解信息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但同時是不是還包含著這樣的可能，在資本和市場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媒體工業中，在中產和預備中產占絕對主力的媒體人的觀念中，一個近三億人口的新工人群體，無論是工傷，還是職業病，抑或其他的困頓，都早已屢見不鮮，這樣的故事，其消費的新聞價值已經極其微小。說白了，就是還有多少報道的意義？信息的交換和傳播遵循的是利益和消費主義，只有消費主義才能最大化地實現其利益，或者幹脆地說就是資本的增殖。而這正是今天媒體產業幾乎唯一的運行邏輯，更準確地說，是運營原則。在這一原則的作用下，胡鳳超的故事，如果沒有更吸引眼球的內容，其傳播價值無疑微乎其微。但更重要的是虛擬的網絡世界並不能徹底取代實體的社會。可以想象，如果胡鳳超不主動電話聯系媒體，他也不可能在臨終前實現他捐獻遺體和器官的願望。

於是，我們看到，騰訊新聞的聊沈客戶端在19日發表的新聞，標題“鞍山帥氣小夥患罕見血液病 想捐獻遺體和器官”中就充滿了這樣吸睛的符號。只有吸睛，才能吸金。一個孤苦無告、病入膏肓、行將赴死的年輕的新工人不存在了，只有帥氣，仿佛死神也會因其顏值而放棄原來的計劃。“帥氣小夥”會引來目光，瀕死的“帥氣小夥”會引來同情和憐憫，瀕死的“帥氣小夥”捐獻遺體和器官會引來讚美。所有的關註都需要一個“帥氣”的前提。“顏值”，這令人無恥地將容顏和身體變成商品的詞匯是怎麽生產出來的，是誰創造出來的？不幸的是，“顏值”就是新浪老板所說的、可以分享的“興趣”。更令人憤怒的是，再生障礙性貧血怎麽就成了“罕見”的？是的，我難以克制地憤怒了。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再障，但絕不罕見。更重要的是，胡鳳超明明是因為工作原因才患上絕癥，而他工作的單位是中日合資的華錄松下電子信息有限公司。而報道缺這樣輕描淡寫地寫道：“2010年剛剛過完春節……他來到位於大連市的一家中日合資電子產品企業，從事噴塗工作，這次他想多賺點錢早點娶妻生子，回家孝順老爸。然而，在這裏工作兩年時間後，因長期接觸苯，胡鳳超被確診為再生障礙性貧血，他成了一名職業病患者。”我不能不感嘆，我們的記者是多麽富於職業道德，他們的職業道德就是將“兇手”的“姓名”隱藏起來，將一個年輕的健康的生命在不被告知的情況下而患上絕癥的過程雲淡風輕地滑過去。

（穿著結婚禮服的胡鳳超）

該報道被騰訊新聞放置在“社會萬象”欄目，“文章標簽”就是“罕見病”。但報道只署“遼沈晚報-聊沈客戶端”和一串字母的責任編輯，徹底的符號化抽空了編輯的生命屬性，他們不過是資本所有也是資本主導的媒體產業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

更耐人尋味的是，報道原本是胡鳳超在7月18日找到《遼沈晚報》才有的，而《遼沈晚報》的發表卻晚於騰訊新聞。20日《遼沈晚報》發表了相對較為完整的版本，並有記者署名（實際上關於胡鳳超的所有媒體報道，凡署名的都是這位記者），推測記者也應該是《遼沈晚報》的記者。但為什麽是騰訊新聞這一完全商業性的媒體率先發表，並對文章進行了適合自己風格以及他們想象的讀者趣味的修改？騰訊新聞與應該屬於政府官方的《遼沈晚報》是怎樣的合作關系？而由此形成的利益分配又是怎樣的？

很明顯，在《遼沈晚報》較為完整的報道中，文字中包含的情感性要高於騰訊新聞。而且，報道最後還誠懇地表達了希望，“如果有志願者願意照顧胡鳳超幾天，給他一些陪伴，請聯系遼沈晚報。”之後也確實有好心人去醫院探望、安慰。但報道也有比騰訊新聞更糟糕的忽略，這一次，既沒有出現職業病這個無比重要的關鍵詞，連苯中毒都沒有，也沒有出現華錄松下電子信息有限公司。一切似乎都只是一個自然的現象。我不知道這是記者的疏忽，或根本缺乏這一意識，還是報社刪除了這些至關重要的信息。然而，無論哪一種可能，它都是當代中國媒體生態真實狀況的展示。也正因為缺少這些關鍵信息，使胡鳳超的故事只剩下了廉價的同情，連同他最後的完全而徹底的奉獻也被玷汙。

（胡鳳超的工號牌）

我一遍遍地看著胡鳳超在生命的最後時日裏留下來的這些無助而堅韌的求告，卻也一次次地試圖想象他在那些不發微博的時間裏是怎樣度過的。在那些不多的空白的日子裏，他在做什麽，又在想什麽？但是我想象不了。可越是無法想象，我就越會將他最後的辭世當作時代之惡的結果。

七

世間並沒有籠統、普遍的善惡，今天的時代之善惡同樣如此。胡鳳超的死最充分地體現了這個時代的善和惡。

7月22日，就在胡鳳超辭世前一天，騰訊新聞-聊沈客戶端發表了題為“重病小夥登記捐遺：這下心裏踏實了”的報道，敘述了前一天沈陽紅十字會志願者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到醫院填寫申請表，頒發捐遺登記書的過程。梨視頻沈陽站也發布了56秒的視頻，標題是“他患重病捐遺體 父親倒床大哭”。看著這樣的文字和視頻，我只想問：胡鳳超的心踏實了，我們的心能不能踏實呢？恐怕很難。

胡鳳超其實一直在等待，在期盼。從他的文字，還有他早就想好的捐獻，我們知道，也許在開始的時候他還幻想著奇跡，能夠通過微博，像上一次那樣，獲得一個組織化的機構的幫助，獲得足夠支持他完成骨髓移植的昂貴醫藥費，也因此獲得重生，但慢慢地，他不再奢求，但他並沒有怨恨任何人，更沒有仇恨社會，起碼從他的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甚至對奪走了他的生命的企業也沒有表達過這樣的情緒。他不再奢求重生的奇跡，卻並不意味著他沒有任何期待，起碼他期待不是獨自面對死亡，期待有人來安慰他年邁的父親，和他新婚的妻子。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老父親，對記者，他這樣說：“治療已經沒什麽希望，我不想再浪費錢，為了給我看病，老父親已經把家裏的房子賣了，今年要種的青苗也賣了。在我第一次患病時得到過很多好心人幫助，現在我想回報，用我的全部，用盡我生命最後一絲力氣回饋社會。”（《結婚兩個月舊病覆發 他決定捐獻全身器官和遺體》）看著這樣的話，我們能踏實嗎？

我不知道胡鳳超的後事如何處理，誰來處理，他的工作單位華錄松下是否會出現，是否會承擔相應的責任和費用，是否會考慮他父親的情況，給老人一個較好的安排，讓胡鳳超泉下有知而得以安息。還有他老家的村政府，是否會給予老人應有的幫助。

從制度層面來說，胡鳳超是近三億新工人中的一員，他比老賈好一點的地方是華錄松下承擔了第一次的醫療費用，之後則是社保基金承擔職業病相應等級的社保支出，然而，在胡鳳超覆發後，企業完全不聞不問，媒體報道對企業只字不提已經令人發指，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社保的制度性局限造成的，既有的制度根本沒有考慮像胡鳳超這樣的情況應該給予更多的保障和經濟上的支持，否則，就只能像胡鳳超一樣，在求告無門、無望之後，為了不再給家人已經沈重的負擔上面再增加無法預計的重擔，他只能選擇死去。我絕不相信這一點在制度層面實現不了。沒有實現不了的制度，要緊的是制定制度的人有沒有這個心。但從胡鳳超的遭遇，我們看到的只是冷漠的毫無人性的制度。

胡鳳超的求告無門同樣是時代之惡的癥候。個人，特別是像胡鳳超這樣的新工人，在巨大的勞動力市場中，他就像一葉浮萍，無力主宰。單位不管，村政府不管，總工會不管，唯一的大概就是一點可憐的社保基金。有一個數據可以充分地證明這一點。據《2016年農民工監測報告》相關數據：“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難時，62.4%的進城農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親戚幫忙，找老鄉的占28.9%，找本地朋友的占24.7%，找單位領導或同事的占11.7%，找工會、婦聯和政府部門的占6.8%，找社區的占2.3%。找家人、親戚幫忙，找老鄉和找本地朋友幫忙的農民工比重分別比上年提高0.7、1.1和1.4個百分點。當權益受損時，進城農民工選擇解決途徑依次是：36.8%與對方協商解決，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30.1%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比上年下降4.5個百分點；27.2%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比上年提高5.1個百分點。”一大半的新工人之所以有困難了仍然延續著古老的求助渠道，部分原因是他們不知道該找誰，可更重要的原因實際上是制度的缺失和疏漏，同時，主流又就法律當做救命的稻草扔給了他們。

他曾經得到過社會的幫助，這一次他湧泉相報，將自己全部奉獻。但醫生說了：“胡鳳超的病情比較嚴重，已經無法進行骨髓移植手術了，目前僅是用藥維持生命。”就是說，如果能夠及時進行骨髓移植，胡鳳超也許就不會死。但資本操控的新媒體堵死了他唯一的生路，他曾經獲得幫助的社會，但現在，社會在哪裏？社會已死。

他曾經在輕松籌發起眾籌，但他得到的僅僅是支付骨髓移植手術費用的9%。“2014 年 9 月，北京輕松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輕松籌’作為公司旗下的首要產品，將目標聚焦在公眾健康保障領域，各功能板塊均與百姓健康保障息息相關。由輕松籌獨創的‘大病救助’模式幫助眾多病患在第一時間解決了醫療資金等問題。所謂正本清源，為了從源頭解決醫療資金問題，輕松籌於 2016 年 4 月推出了‘輕松互助’業務，其目的在於抱團抵抗大病風險，一人患病，眾人均攤救助金。”微信是輕松籌傳播的主要渠道。這也就使胡鳳超發起的輕松籌只能基本上局限在手機通訊錄的範圍內。而圖一的數據可以清楚地告訴我們，微信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說正是“媒體的壓迫性應用”，即因為人際關系的強關系而不得不使用，但真正壓迫性的源頭實際上是資本生產的技術霸權和資本在日常生活領域中的強大影響力。

微信技術的普及正與當代中國社會的階層固化構成了一個相互生產的關系。窮人的親戚朋友多半還是窮人。胡鳳超沒有實現的眾籌並不是特例，而相反的例子同樣也很多，中產階層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募集到遠超過20萬的資金。胡鳳超的眾籌失敗再正常不過了，因為他朋友圈的經濟條件多半也跟他差不了多少。在這個意義上，必須重新思考媒介技術與階層固化之間的關系。破除階層固化不僅僅是一個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問題，同時也事關技術這一生產力因素，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技術究竟為什麽人服務的問題。

但結果恰恰是我們遭遇的最糟糕的結果，之所以如此，在我看來，非常關鍵的一個是微博、微信、輕松籌等等新媒體的所有制屬性。無論是新浪公司，還是騰訊公司，BAT這三個當代中國最普及的新媒體都是私人資本，包括國際資本，雖然是股份制，但並沒有改變它私有的屬性。表面上看起來，新技術帶來了繁榮，但這一繁榮除了消費的繁榮外（包括越來越多的微信公眾號，其實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造成的物的極大剩余一樣，是作為商品的信息的極度過剩），並沒有凝聚成一個有真正活力的社會，而只是形成了一個日益封閉、穩定甚至超穩定的階層/階級結構，在這個結構中沒有流動。在這樣的新媒體中，所謂的信息的自由流動和自由交換，不過是一句美麗卻極其惡毒的謊言。胡鳳超就死於這個謊言。這樣的媒體環境下，胡鳳超必死無疑。

傳播的本意是要增強溝通和交流，加強信息的流動，使信息無阻礙地流向信息的發布者希望流向的地方，並被接受到，繼而作出相應的處理。就如同社會的本意中包含著互助一樣，傳播最重要的是信息和意義的傳播，而不是利益的交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播早已不是一個純粹技術性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的總體性建構的大問題。如果一種新的媒體只是為了利益的交換，只是為了利潤的攫取，它是合法的嗎？如果一個社會充斥的只是利益關系，只是為了個人的訴求，它還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嗎？如果一項制度只是為了保障個人的抽象的權利，它還是一項好的制度嗎？胡鳳超死於這個媒體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難道不是這個時代之惡最有力的證明嗎？因此，胡鳳超最有意義的奉獻不是他捐出了遺體和情感，而是讓更多的人思考這些問題，並作出自己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說，我相信微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被另一種社交軟件和平台所取代，我希望新的技術能夠打破微信的封閉性，能夠以重建社會的有機聯系為目標，而不是參與階層/階級固化，阻止流動性，只追求消費的快感和炫耀的虛榮的滿足。

胡鳳超留在人世間的眼角膜在註視著我們。

 2017.07.28淩晨於上海寶山